



傅立叶传

傅立叶传

〔苏联〕阿·鲁·约安尼相著

汪裕蓀譯

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

A. P. Иоаннисян

ШАРЛЬ ФУРЬ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8

傅立叶 (1772—1837) 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著作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本馆出版的《傅立叶选集》(一、二两卷已出版，三、四两卷即将出版)收集了傅立叶的主要著作。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傅立叶的生平思想，我们又译出苏联作家阿·鲁·约安尼相著的《傅立叶传》一书，以供研究参考。书后附有参考书目，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傅立叶思想，是有帮助的。

Fùlìyè ZHUÀN

傅立叶传

〔苏联〕阿·鲁·约安尼相著

汪裕藻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373-3/K·42

1961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109千

印数 2,400册

印张 4 1/4 插页 8

定价：1.65元

目 次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1
第二章 傅立叶的青年时代.....	24
第三章 “发现”.....	34
第四章 爭取承認.....	46
第五章 第一批信徒.....	62
第六章 文明制度与和諧制度.....	73
第七章 老师和学生.....	93
第八章 晚年	115
参考书目	125

第一章 空想社会主义

(一)

1516年，杰出的英国人道主义者、鹿特丹的爱拉斯謨的朋友托馬斯·莫尔用拉丁文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書名长而奇特，叫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在这本小册子中，莫尔借他的主人公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叙述了一个烏托邦島的故事，據說这个島在遙远的西方某地。在这个奇异的島上沒有私有制。全体公民都必須劳动。在專門选举出来的攝护格朗特(行政長官)的监督下，每个家庭各从事一項有益的手工业。此外，全体公民都必須在特設的农业生产队中工作两年。这个島上沒有貨币交易。一切产品，无论是农产品或者是手工业产品，都一律繳入公共仓库，每个家庭的家长从这里領取一切生活必需品。島上还有公共食堂。

可見，还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兴时期，莫尔就在亲眼看到农民失去土地和人民大众因資本的原始积累而貧困的影响下，制訂出空想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这种空想共产主义反映着对无阶级的社会，即对无寄生和剥削的社会的模糊憧憬。

“烏托邦”是莫尔虚构的一个島名，后来开始成为通用的名詞。不久，便出現其他一些“烏托邦”故事，內容都是叙述十分离奇的共产主义社会或国家的。在同一十六世紀，意大利人邓尼发表了他的烏托邦；而在十七世紀初期，又出現了康帕內拉的名著《太阳城》。在英國資产阶级革命时期，“真正平均派”的著名代表之一溫斯坦萊发表了关于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論著作《自由法》。

十七世紀末期，类似的著作也在法国出現了。德尼·維拉斯

的《塞瓦兰人的历史》在 1675 年用英文出版，后于 1677 年用法文在法国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叫西登的船长的惊险故事，他因船只失事而漂流到澳洲。西登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的“塞瓦兰”国家。这个国家的创始人塞瓦里斯认为，一切罪恶都来自三个主要恶习：骄傲、贪欲和闲逸。因此，他不仅要永远消灭一切社会隔阂，而且还要取缔私有制，使全体公民都必须履行劳动义务。在“塞瓦兰”国内，一切居民分属于各个公社（奥斯马基）。全体公民都在公共房屋里共同劳动和共同饮食。有乡村奥斯马基和城市奥斯马基，还有学校奥斯马基。生产是按照计划原则组织的。一切多余的产品都缴入公共仓库，每个奥斯马基从这里领取一切生活必需品。

维拉斯的小说引起了无数人仿效。虽然法国第一部空想共产主义著作的出版迟于英国和意大利，但是在后来，法国在大量出版这类书籍方面却跃居了首位。封建专制制度的危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增长，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社会矛盾，促使十八世纪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很多乌托邦小说，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共产主义倾向。

大多数的乌托邦作品很少有独特之处，结构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这类书籍的大量出现，却证明共产主义思想已在接近下层群众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而共产主义思想是永远伴随着“作为近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的先驱者之阶级”^①的运动的。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文坛上出现了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的著作。摩莱里和马布利首先作了这样的尝试，在他们的著作中“简直已有共产主义学说了”^②。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87 页。

^② 同上书，第 38 页。

馬布利只是有条件地承認共产主义，而不認為共产主义可能在他的时代实现（实际上，馬布利同卢梭一样，只是幻想社会的平等状态，而沒有幻想消灭私有制）；而摩萊里則不同了，他在《自然法典》这部有名的著作中捍卫了共产主义，認為它是理想的和唯一使人向往的社会制度。

按照摩萊里的意見，共产主义是与“人类的本性”，即人們的天性相适应的。所以人类初期的原始社会制度（当时人們还处于自然状态）是家长制共产主义制度，土地是公有财产，人人都可以平均地享用土地上生产的財富，自願地服从长者的管理。然而不幸得很，人們不久就脱离了这种自然状态。由于某种原因（摩萊里認為，可能是由于人口增加），出現了成文的法律，而代替了家长制管理。法律的制訂者由于自己无知而規定平分公共財产，从而允許私有制存在。私有制使人们产生了貪欲，而貪欲就成了当时社会所特有的无数恶习的根源。为了杜絕这些恶习和恢复人們的幸福，就必须廢除私有制。

摩萊里不仅宣傳理想社会制度的一般原理，而且制訂了这方面的模范立法。摩萊里認為，这种立法應該根据三条“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1)什么东西也不应当据为私有，但直接用于消費和生产的东西除外（用于生产的东西指的是手工业劳动工具）；(2)全体公民都由社会供养；(3)每个公民都必須參加适合他的体力、才能和年龄的劳动。其他法律詳細地規定着社会制度的一般原則。一切生产都集中在各行业所屬的公共作坊里，作坊由工长领导。至于农业劳动，也同莫尔的主張一样，凡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公民都必須参加。全部产品都拿到公共市場，然后向公民分配。剩余的消費品繳入公共仓库，根据需要分配給各个家庭。除了某些产品由于受数量上的限制由国家規定分配定額而外，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物品。

十八世紀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在摩萊里的學說中得到了最完备和最典型的反映。在这个时期的法国空想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一种理論上的理想，是从純唯理論的立場上論証的一种合乎“人类的本性”的合理而自然的社会制度。他們的共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粗鄙的平均主义性質。这是一种通过普遍平均来消灭現存的阶级不平等和社会矛盾的思想。例如，摩萊里在他的立法中，甚至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公民的日常生活、直至婚姻关系，都作了最細致的、带有强制性質的和一律的規定。他提倡飲食适度和禁止修飾，因为注意修飾会造成人們之間的差异。当时的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也主張規定統一的衣食，只把这一点看作真正平等的保障。

十八世紀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所特有的这种粗鄙的平均主义倾向是不难理解的。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工場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反映受着封建制度和資本主义剥削痛苦的社会下层情緒的作家們，除了描述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以外，不可能宣傳別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不仅是财产平等論者的特点，而且也是宣傳必須完全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家的特点。由于缺乏实现这种思想的实际前提，所有这些希望都变成了脱离生活的抽象理想。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即巴貝夫主义者（巴貝夫和“平等派密謀”的其他参加者）的共产主义，也带有这种粗鄙的平均主义性質。

这个运动的历史意义是极其巨大的。巴貝夫及其拥护者們参考雅各宾党的革命民主主义专政的經驗，进行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初次革命嘗試。尽管是密謀的策略不够妥当，尽管是他們与群众的联系不够，但这毕竟是一个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事实。在巴貝夫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已經不是理論上的理想，而是直接

的实践目的。在筹划“平等派密谋”的时候，他们以法令、宣言等形式制订了实践措施，预定在变革以后实行，以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但是，巴贝夫主义者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仍旧是十八世纪旧的、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巴贝夫本人不止一次地自称为摩莱里《自然法典》思想的继承人。的确，《自然法典》对巴贝夫本人及其拥护者们的世界观的形成是起了最直接的影响的。他们也宣扬“平均的和纯洁的适度”，主张生活俭朴，认为必须取缔即使在表面上违反“平均原则”和不能为大家所获得的一切东西。有些巴贝夫主义者，特别是希尔文·马雷沙尔，甚至甘愿牺牲“艺术”而追求“实际平等”。

因此，《共产党宣言》着重指出，巴贝夫主义者的作品虽然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是“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①。因此，恩格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把巴贝夫的思想同摩莱里、马布利和十六到十七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加以联系时，也写道：“这种新学说的最初表现形式是斥责一切人生享乐的、禁欲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②

(二)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期才出现了社会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是在新的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别。

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是两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即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① 《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99页。

②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8页。

十八世紀后半期，在社會經濟發展比較先進的英國開始了產業革命，結果產生了大規模的機器工業。隨著工場手工業生產向工廠生產過渡，隨著資本主義從工場手工業階段向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過渡，而產生了社會大變革，引起了社會大震蕩。英國產業革命的結果，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大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兩者之間的對抗開始成為主要的社會因素。無產階級是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下形成的。因土地改革而失去土地的農民以及因為無法同大工廠生產競爭而破產的手工業者紛紛加入工人的隊伍。工人遭受殘酷的和毫無限制的剝削，十六到十八小時的工作日，微薄的工資收入，女工和童工的廣泛雇用，失業威脅的經常存在，極端困苦的居住條件——這一切使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劇烈地惡化了。隨著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工業增長而蓬勃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大城市和工業中心，呈現出一幅鮮明的、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圖景。

在英國發生這種社會變革的同時，法國在十八世紀末發生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不僅消滅了陳腐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在法國建立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而且還摧毀了全歐洲的封建主義的基礎。在法國革命軍隊和拿破崙軍隊的先後打擊下，歐洲的政治區劃地圖改變了，德意志、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幾世紀來的封建秩序破壞了。甚至在拿破崙帝國崩潰後暫時獲勝的貴族君主政體的反動勢力，也不能長時期支持住腐朽了的歐洲封建主義大廈，使其免於最後傾覆。

新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新的資產階級社會關係，到處都战胜了舊的社會經濟生活。資產階級革命促進了法國大工廠工業的發展，因而在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法國也開始了產業革命，並形成了工業無產階級的隊伍。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到三十年代中，德國和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也開始了產業革命，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逐漸

形成起来。自 1825 年起，开始出現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机。

十九世紀初期的欧洲与十八世紀的欧洲形成了鮮明的对照。在 1789 年，封建制度还几乎完全統治着整个欧洲大陆，而到十九世紀初期，尽管欧洲还有許多君主国家和貴族政府，然而情况毕竟是不同了。在某些国家，包括法国，已經建立了資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在別的一些发达的国家，資本主义关系日益排挤着陈旧的封建关系。无怪乎这个狂飈时代的人們，即经历过这些“最偉大的历史事件”（歌德語）的人們要經常談到“新世界”的誕生了。

在新的資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也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學說。恩格斯在他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反杜林論》中，对十九世紀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前提作了經典性的描述。

在引起許多幻想的法国革命的風暴刮过以后，人們看到十八世紀启蒙运动者所預言的理性王国，“不是别的，正是資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正實現于資产阶级的司法之中；而平等則归結为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資产阶级的所有权被宣布为最根本的人权之一；……”^① “富有和貧窮間的对立，非但沒有在普遍幸福之中获得解决，而且反而因为那种沟通对立的行会的和其他的特权的廢除，以及那种稍微緩和貧富对立的宗教慈善設施的廢止，而更加尖銳化起来。現在在事实上所实现了的脫离封建桎梏的‘財产自由’，对于小資产者和农民，不过是把他們被大資本、大地产的强烈競爭所压碎的小財产出卖給这些大財主的自由罢了。这样，‘財产自由’对于小資产者和农民就变成了脫离財产的自由。在資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劳动群众的貧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 頁。

穷和困苦成为社会生存的必要条件。现金交易，象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这个社会的唯一联系因素。犯罪的数目一年一年地增加。如果以前的白昼横行的封建的罪行——这些就是到现在也没有消灭——如今变成了次要的话，那末，以前只在暗下偷着做的资产阶级的罪恶，现在却放肆进行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爱’，实现于竞争所产生的诡计和嫉视之中。贿赂代暴力的压迫而兴，金錢代替了大刀成为社会权力的主要杠杆。‘初夜权’从封建主轉移于资产者、工厂主。卖淫增加到空前的程度，甚至婚姻本身，依然和以前一样，是法律所承认的卖淫形式和卖淫的官式的掩盖，而且此外还有多得很的通奸事件来作补充。”^①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要出现一些人开始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对他们当时所处的现实表示沉痛的失望。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并以新的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理想来与资产阶级社会对立，这种社会主义与革命以前时期的原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有所不同。

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学說尽管与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共产主义理論有着質的差別，但是仍旧带有空想的性質。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还不存在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前提。欧洲的大资本主义工业只是刚刚诞生。生产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間的矛盾初露端倪。工业无产阶级尚处于形成阶段。工人运动刚刚开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未提高。工人阶级还没有意識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无产阶级还刚刚从一般沒有財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阶级的萌芽，它还完全不能作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現出只是一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40页。

种受苦的被压迫的等級，由于它无力帮助自己，所以对于它的帮助只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

“这种历史的情况决定了社会主义創始者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論，适应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成熟的状况、不成熟的阶级关系。解决社会問題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展的經濟关系中隱藏着，所以不得不从头脑中发明出来，創造出来。”^①

因此，尽管这三位偉大的思想家在十九世紀初期譴責了資本主义社会和論証了新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但是仍然同他們的先驅者一样，都是空想主义者，不能够揭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結構，不能够揭露資本主义剥削的本質，不能够发现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也不能够闡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无论圣西門，还是欧文或傅立叶，都把无产阶级看成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众，对他们的不幸表示同情，并力图減輕他們的苦难。但是，三人都未能看出无产阶级是能够最終摧毁資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社会力量，也不認為自己是他們的利益的代表者。相反地，三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認為，他們在批判現存的社会制度和提出新的社会制度的时候，也在維护整个社会的利益：既維护“穷人”的利益，又維护“富人”的利益，所以尽力說服“富人”，使他們也要深切关心社会的改造。同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一样，十九世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純唯理論地論証新的社会制度，把它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自然的、公正的，既适合人們的本性和需要、又适合真正道德和永恒正义的要求的社会制度。他們認為，用和平的方式，即通过耐心的宣傳和借助于掌权者是可以实现这个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深信，当时的执政者和有产者阶级的代表相信新的社会制度优越以后，不仅不会反对这一新制度，而且还会自己来着手实现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頁。

这一制度。人們至今所以还生活在如此困苦和違反自然的社会条件下，只是因为人們還沒有了解理性和正义的真正規律。为了使人类擺脫一切貧困和罪恶，必須發現这些規律，研究合理而公正的社会結構。这三位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每个人当然都把这种“發現”的荣誉归于自己了。

在《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一文中，列宁描述十九世紀初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質时写道：“这种社会主义批評資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罵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較好的制度出現，劝导富人，說剝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闡明資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質，又不会發現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創始者的社会力量。”^①

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的一般理想就是如此。他們的理想彼此接近，而且使他們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空想主义的性質。但是，这三位偉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的原則和細節方面并不是彼此完全相同的。圣西門、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主流。同时，每种学說都含有宝贵的原理，这些原理是社会主义思想宝庫的珍藏，后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訂科学的社会主义时曾加以批判地利用。正因为如此，十九世紀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三)

年輕的伯爵昂利·克劳德·圣西門(1760—1825年)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十九岁时随法国军队前往当时正在进行独立战争的美国。經历了一系列惊險事件以后，在1784年回到法

^① 《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頁。

国，不久就离开了军队。

尽管圣西门是贵族出身，可是他并不敌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伯爵称号，参加了革命运动，但后来在恐怖时代被逮捕了，坐了数月监狱。几笔大宗的土地投机生意，使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在执政内阁时期，圣西门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科学界的著名人物的集会中心。

不久以后，命运的变迁很快使他荡尽了财产。在十九世纪初期，他已成为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和他以前救济过的许多熟人一样了，此后，除了在当铺和阿尔信纳尔图书馆短期任职以外，一直依靠朋友们的资助生活。在法国的反动势力复辟时期，他的物质生活状况才好转起来。到这个时期，圣西门业已因为自己的著作而出名，周围有了不少信徒。

圣西门早在 1802 年就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但是最有名的几部著作，比如《论工业制度》、《工业家问答》和《新基督教》等，都是在他生平的最后十年写成的。

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一种能够根据新的原则来改造社会的哲学。按照他的说法，每一种社会制度都以某种哲学体系为基础。一种哲学体系代替另一种哲学体系，是合乎规律的过程。由此可见，圣西门是从历史过程的规律性观点出发的。但是，由于他承认思想体系先于社会经济结构，所以他的历史哲学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观点上的，虽然他在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时偶而也曾有过唯物主义的看法，估计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按照圣西门的意见，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每个新的社会形态都比以前的社会形态前进一步，因而是更完善的社会形态。

最初，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人们崇拜偶像，只知采集食物。后来，出现了奴隶制度，而成为当时的进步现象，因为人们不再杀死

俘虏，而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的宗教哲学体系就是多神教，即同时供奉许多神。

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多神教体系的危机。早在苏格拉底时代，这一危机就开始了。基督教的传播表明一神教的最终胜利，所谓一神教就是只承认有一个神的宗教。随着一神教的发展，产生了封建神学的政治体系。这时，奴隶制度为农奴制度所代替。世俗政权转入军事封建主手中，而思想上的领导则归于僧侣阶级。在这个新的社会体系下，人类的知识迅速地发展起来，工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自十五世纪起，封建神学制度也遭到了危机。反对这个已经腐朽的体系的斗争，从思想和政治方面开始了。世俗科学的代表人物（学者）领导着这一思想斗争；从哥白尼到法国启蒙哲学时期的思想斗争，就是以此为特点的。而新兴的阶级——工业家阶级也参加了反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

圣西门以法国为例对历史过程作了极有趣的叙述。他从两个阶级（封建主和工业家）的斗争角度来考察近几个世纪的法国整个历史。他研究工业家阶级（包括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土地所有者）自十字军远征以来的逐渐成长，论述他们从路易十一世时起与君主政权建立的反封建联盟，考察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分析封建神学的政治制度与阶级力量实际对比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矛盾。这种发展终于导致十八世纪的革命，但是，按照圣西门的意见，这次革命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只是完成了消极的、非建设性的工作。不错，革命彻底地粉碎了旧的封建神学的政治制度，但却使政权转入中间阶层（形而上学者和法律学家）手中，而没有当然地落入工业家和学者手里。可见，历史的任务在于把法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也就是建立由工业家和学者领导的新社会制度。

这种“工业”制度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既然每一社会形态的基础都是一定的宗教哲学体系，那末，按照圣西门的意见，未来的

社会的基础也应当是一种新的哲学，他把这种哲学称为“新基督教”。圣西門用下述的話表述了“新基督教”的基本原則：“人們应当有一个对最多數人最有利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目的是最迅速地和最充分地改善社會中最貧困階級的道德状况和物質状况。”在圣西門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具体說明“最貧困階級”这一概念时，已經談到无产阶级。可見，未来社会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

只要把社会的领导权轉归工业家和学者，也就是轉給工业和科学的代表者，这一目的就可以达到。圣西門沒有認識工人与企业主之間的階級利益对立。他认为企业主也是同工人一样的劳动者，并拿他們与游手好閑的寄生者——不参加社会生产的食利者对立起来。圣西門把雇佣工人和資本家都列入他的工业家階級，認為在工业企业老板的积极参加下建設新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工业”制度的基本特点应当是没有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圣西門把必須从事社会劳动这一綱領貫彻在他所有的著作当中。因而，新社会将是劳动者的社会，将是从事有益劳动的人們的联盟。在这种社会里，人們的領導者将不是由于出生在富門的偶然因素所决定的，而完全是根据能力和天才选举出来的。

一切現實的世俗政权都应当集中在工业家委員会，而宗教权力則应当集中在科学院。这两个組織也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有計劃的领导。正因为如此，圣西門把未来的社会制度称为“协作社”，并以此与資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相对立。新社会与旧社会不同，它不应当符合少数人的利益，而应当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旨在維持秩序的旧管理职能将逐渐消灭，而由领导工业工作代替。可見，对人的管理将被对事物的管理所代替。人类的全部力量将不是用去相互管理，而是用去共同开发